

法哲学学术译丛

城邦与国家

——政治哲学纲要

〔德〕吕迪格尔·布伯纳◎著

高桦◎译

Polis und Staat:

Grundlinien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城邦与国家

——政治哲学纲要

〔德〕吕迪格尔·布伯纳◎著

高桦◎译

Polis und Staat:

Grundlinien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邦与国家:政治哲学纲要/[德]吕迪格尔·布伯纳著;高桦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1

(法哲学学术译丛)

ISBN 978-7-01-019801-9

I. ①城… II. ①吕… ②高…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5755号

原书名:Polis und Staat:Grundlinien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原作者:Rüdiger Bubner

原出版社:SUHRKAMP VERLAG,2002

版权登记号:01-2014-5172

城邦与国家

CHENGBANG YU GUOJIA

——政治哲学纲要

[德]吕迪格尔·布伯纳 著 高桦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1.25

字数:200千字

ISBN 978-7-01-019801-9 定价:4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德国大学图书馆的重点推荐图书。

政治 (Politik) 是最为古老的哲学论题之一。智者们在柏拉图明确地发现了政治，而直到康德式的思想革命发轫为止，体系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始终萦绕在政治之上。当然，在这其中借由近代国家之建构而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对政治事务的理解，这种理解至今规定着我们的各种看法。

自 20 世纪政治科学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作为一门特殊学科的解放开始，它与哲学的关联进一步断裂了。正如人们此间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形对于政治和哲学双方来说都无益处。因此，本书自其开端起回顾了政治思想的传统，而着眼点则停留在当下政治哲学及其系统性的诸问题之中，并由此秘密地产生了与政治学 (Politologie) 之间的争论。

目 录

导 论	/ 1
附录与预览	/ 11

第一部分 作为生活形式的城邦

第一章 古风时期的前奏	/ 25
第二章 启蒙与僭主制	/ 33
第三章 在各司其职的地方必须聘用哲学王	/ 41
第四章 自由和平等的人们的自治	/ 59
第五章 借助于语言的政治参与	/ 73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主义向私人领域的转化	/ 81

第二部分 作为组织机构的国家

第七章 马基雅维利那里的权力技艺的序幕	/ 95
第八章 在由君主向人民过渡中的主权规定	/ 104
第九章 利维坦神话及其反对者	/ 113
第十章 历史思想之前孟德斯鸠的历史主义	/ 129
第十一章 黑格尔的国家概念	/ 138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与制度	/ 156
结束语 超国家的欧洲?	/ 166

导 论

如同其他众多学术专业一样,政治学(Politologie)已经从哲学的管辖中解放了出来。哲学系曾一度包括的东西涉及了神学、法学和医学三者全部的认识领域,而这些领域如今处于这三个“较高级系科”的关注之下。心理学与教育学,社会学与文学,以及化学与物理学,都从哲学系古老的、并不严格按各学科编排的研究和讨论语境中产生。关于政治原理的知识正襟危坐于各种意见、活动和斗争等日常事务之上。为什么这一知识不能获得作为理论的独特地位呢?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政治原理的问题——比如,政治自身的观念,关于法与正义的规范认识,统治与服从法律的角色作用,以及人们就公共福利的形态进行意见交换的持续性媒介——,不能完全托付给各类专家。一个哲学家不能是教育学家或者文学专家,虽然这两者在面对青年们、学生们和广大公众时有所助益。但如果一个哲学家,至少是一个在实践哲学领域内工作的哲学家,对政治无所关注且不把这种缺失看作缺陷的话,那么他就脱离了哲学问题伟大的传统线索。

因为,自古希腊肇始,政治(Politik)就是哲学的一个中心主题,与智者的理智运动相对,政治定义了那种向智慧的人所表示的公开敬意。梭伦(Solon)“重新竖立起”雅典人的各种关系,因此他是第一个代表。传统都把他看作文化奠基者阶段的“七哲”之一。众所周知,在柏拉图的对话作品中政制(Politeia)处于中心地位。直到18世纪欧洲,在实践问题中,柏拉图的批判者亚里士多德都伴随着理论构建的整个基础。康德主义首先凭借其严格的反对幸福论的立场和普遍的现代性激情(Modernitätspathos)终结了这个传统,它使得国际性的讨论持续具有吸引力。与此相对,自20世纪早期开始,先是在海德格尔及其后学那里,随后在社群主义学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于亚里士

多德的思索。人们总是面对着这样的局面——由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变化不只存在于实践的事物之中,并且还以一种显著的方式,通过对内在冲突的彻底清楚的讨论,使我们看到思想劳作是如何得以发轫的。

与回忆这些开端相比,如今的思考将表明:虽然我们并不具有完全得到承认的政治事物的概念,但一切事物皆可以在某种作为“政治相关的”(politisch relevant)意义上得到把握。婚姻、家庭、性别角色、儿童教育和培养,这些曾经属于私人范围的东西被政治化了。文化听从于天赋与专长的独特规则,其一度自主的维度必须考虑到各政治表态和所应对的攻击。而一度不具有责任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有政治意义的事物(Politikum),在一个全球的层面上,人们借由对于环境保护的关切而谈论自然。

在那些曾经似乎与政治无涉的领域中,政治所管辖的范围正在扩大。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与此相应的却是一种对政治理解的模糊性。这种对政治的理解,从权力中心和配以权威的机构那里出发,进入公众的注意、关切和福利国家经济援助的所有模式之中。19世纪的自由主义有意系统区分的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逐渐互相转变。另一方面,有关20世纪极权主义的各种经验,使得一种对于国家向个体提出任何过度要求的强烈敏感具有其价值。在社会福利国家思想凯旋的队伍之中,自由主义对个人发展可能性的解放消失了。国家极权主义式的误入歧途将通过公开运作的预警系统而得到遏制。真正说来,似乎方向相反的两种趋向有助于使政治的在场处处可见,而我们没有看到拟选一种政治事物之概念的努力,这一概念对应于现代的各种现象,允许我们分类整理那些复杂的类型。

这就是政治学家们(Politologen)的盛期。凭借充分坚决地达到科学性这个理想,政治学家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妥善定义的学科中的专业者。但他们都作为顾问,作为人们乐意倾听的关于一切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的专家、评论家,作为一切公共领域公共关系中被选出的研究者、讲究形象的人、代理人而嬉闹着。借助那项有充分准备的、要求推迟数周进行裁决的辩驳策略,2000年最近一次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①演示了罕见的、关于旧式体系的社会科学之思考。政治学家以频繁被使用且反应迅速的智识类型来服务于对复杂社会进行解释的需求,这种需求出于客观的理由而不断增长着。作为真正的裁判员,政治学家们应该站在技术上臻于完善的媒介宇宙(Medienkosmos)的中心

① 这篇导论写于2002年。——译者注

点上,而这个媒介宇宙由一个可靠的信息部门成长为有关世界观的全面积极的组织机关。

与政治学相似,各种可供比较的科学以社会学(*Soziologie*)和历史学(*Historie*)等形态存在着,这些科学始于那些方法论上得到确定、在对象关系中清楚竖立起来的研究方向——如19世纪的历史学,20世纪的社会学。而一种以真正认识的名义登场的民众启蒙的任务和重担就被立刻分配到了这些科学之上。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表示,他只提供这样的意见:这些意见与其他在大众中流传的、由变换着的经济情况所决定的意见处于自然竞争中。毋宁说,在期待深思熟虑的洞见时,人们询问专业人员并严肃地对待他们。这首先说明,对于每个内容方面的问题我们已能够提出众多的材料,因为这个习惯于量化的信仰科学的时代想要看到:通过这些辅助手段去支持甚或完全建立起实质性的争论和具有实践约束力的决定。没有相关的数字基础,社会学者就不能够使自己的观点为人所知。

尽管如此,依然有效的是:即使在音乐会中,或者更糟糕,即使在一堆能清楚听见的表达意见的杂音中,专家也只发出一种声音。在有其他更强的力量发生作用的地方,专家从未能实现他的观点和建议。虽然援引合理性或者说援引专家作为一种升级的斗争武器而出现,但围绕日常政治事务中抉择的争执却很难给予清楚明白的理性以优先权。朴素地援引著名的政治明智的榜样,援引习俗或精英、阶级或民族的特定的传统,这是无处可行的。

在政治科学化的阶段之前,经过漫长时期的欧洲文明恰恰沿着这些道路行进。如一切历史的事物那样,它的成功是没有把握的。首先要以史为“鉴”,这一相应的信条始终享有很高的地位。翻译为科学理性主义会产生较好的结果,这是有益于政治学平步青云的希望。然而很明显,这种希望是个假象。相关的怀疑早就属于公开进行的争论之标准的保留剧目。

从科学方面说来,专家卷入意见交流,卷入那围绕着对于一切相关者来说正确或最佳的事物的争执之中,是承担现实功能的另一面;科学不会自我满足地沉湎于研究及获取知识,而是希冀成为决断过程中一位受人尊敬的参与者。在此期间,广泛存在的错觉(*Täuschung*)之侧翼呈现了出来,它有意无意地,既指向专业的听众或者行家,也存在于基本见解之普遍性中。这里笼罩着各种权谋的危险。在考虑权衡的过程中,这种危险表现为事实的知识与决断的理由的混淆。部分的数据——我们并不具有其他数据——要求对于其他的相互关联具有说服力。关于选择性准备数据和使这些数据在应用问题上变得可信

这个方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解释工作。它包括了整个统计的技艺,这就像一个没人能够取下的画框。数据无解释则盲——虽然我似乎并不确定,在对康德知识理论的一句名言稍作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说解释无数据则空。最后人们会怀疑,在不去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或者规划与转化之间鸿沟的情况下,从被储存着的数据和由电脑支持的各种程序中推导出来的行动是否合乎逻辑性。

如果现在哲学家要求发言,但可能规定立场的所有方面早就由专家管理着,并且似乎没有人发觉丢失了什么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对于[哲学家的]干涉进行论证的理由显然必须涉及理论的现状。无论如何,如果这种说服力从一开始就是微弱的,人们就只要求一种分离出来的、并且实际上确定的事物之看法,并由外部向持续的讨论表达这一看法。毋宁说,在进行运思中必定变得明白的是,哲学能够作出贡献,但这些贡献原则上无法化为个别科学的阐明。

这就预设了,哲学反思出于自身的能力而遇到了原则性问题,而真正的政治学却忽视了这些原则性问题,或者对其只作不充分的阐明。乍看之下,专业者之所以不会把此间涉及的问题和分歧当作主题,是因为他为了自己的研究活动而不加考察地假定了这些问题和分歧。正如物理学家通常不会去阐明自然在非生命体之因果作用的表面下到底是什么,生物学家不把他所研究的有生命物的概念当作问题那样,通过预先区分对象领域,一切专门的科学在与其他专门的科学似乎不言自明的划界中展开。

亚里士多德早已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断定^①,科学为了支配现实事物,似乎截取现实事物的某一方面,而进一步给出相关的汇报却并不是科学的事务。为了如此这般掌握业已选出的现实事物的片段,并由此表达与这种预先专门化相对立的普遍现实科学(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的构想,科学需要哲学。正如亚里士多德慎重地给其命名的那样,这门他“所寻求的科学”在近代早期获得了存在论(Ontologie)这个学术名称。

但这个问题超出了这样的基础性困难:一种并不特意论证且在原则上没有得到讨论的现实之窄化(Wirklichkeitsverengung)或对象之限制(Gegenstandsbegrenzung);这一困难把哲学家叫来帮忙。在对于各门科学来说绝对必要的专门化的过程中,总是产生这样临时性的决定,而没有专门化,即总是继续进

^① 《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章。

行的专门化,我们就不能获得科学知识。依此,这个问题只能具有不可否定的事实的重要性,它处于一切与城邦相互关联的概念种类的导向之中,必然把哲学提出进行讨论。另外,每个理智之人必然懂得这种逻各斯(Logos)。

在这个方面,如今产生影响的是长久以来与现成知识相关的知识。作为驱使的动力,哲学史的教导并不因此最终与一种关于政治的深入反思告别。通常对此的批评是,这只涉及意见的集汇(Doxographie),而对于过去学说的古旧兴趣根本无用。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即使可能成功地被表述出来,给予我们进一步帮助的并不是对过去理论的原状恢复,而仅仅是经典哲学的意义及宏大秩序对于当下的保证。鉴于实际理论的丰富产物,一种放弃的撤退战术也许根本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完全在反面指出,在书写文化领域对于甚至较远时距之释义学的克服中,如今的我们可通达一种原则性反思的表达与结果。在这种反思中,相较继续发挥作用的理念实体,历史性(Historizität)沦为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个出发点对于接下来的论述至关重要,并且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减弱它的明晰性。

一个相近的考察试图对其进行阐明。是与应当(*Sein und Sollen*)、事实断定与一切规范优先性设定的评价之间的差别通常构成了这一战场,原理的争论在其中得到澄清。与其他关涉经验的研究一样,经验性的社会科学明白自己并不仅仅注意各种是的存有(*Seinsbestände*)。恰恰是在中性描述范围内的适用因素引导了这种看法,因为社会的事实情况总是受规则引导并与价值相关。历史学曾把自己视为直面这些问题的第一科学。它力求一种无关意识形态的对于历史情况的断定,而恰恰因此并不回避对于各种价值的尊重。中世纪的王国就是当时秩序神圣化的中心。近代的革命促成了法律,而现代的各成文宪法并非碌碌无为地说明一份基本法律的目录,而是建立了法治国家的成就。总而言之,关于在其效用和影响中的规范意识根本上属于恰当理解历史诊断的一部分。

这一问题首先在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判断的讨论(*neukantianischen Werturteilsdiskussion*)中蔓延开来。由于没有足够的民意测验调查、选举决定的评估和机构的功能性描述得到采纳,用以说明为什么大众社会(*Massengesellschaft*)带来忠诚,为什么会发起国际层面上的战争,以及为什么处于争论范围内的最高法院的命令至少获得所有同时代人的承认,所以这一问题回转到政治学的领域中。我想以这些事例——恐怕还能为此举出许多其他的事例——指出这种约束性特征,它被算作可观察的外部世界中的确定事件。

新康德主义者们所考虑的效用(Geltung),或依照释义学家们的说法在历史理解中得以实现的意义(Sinn),或黑格尔主义者在历史中由到处存在的瞬息的事件提升为现实之支配性塑造力的精神(Geist)——所有这些都是理论建议,阐明这些理论建议的动机是:在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总体观点中为规范性环节开辟空间,而不以草率的党同伐异(Parteigänertum)损害正确的认识。

政治事务之哲学理论必然迫切要求被安置在各种制度之上,这些制度为社会生活——即在有秩序的相互关联中无数个体的行动——铺平道路并对其继续进行掌控,给出附属的概念形式。制度使一种并非首先旨在冲突的共同生存,在活动者之已有的多元性中得以可能。这些所要求的组织工具必须广泛地铺设开来,以维持历史的过程。因此,它们接受那些要求重视的客体存在的地位,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具有哲学视角的理论家无法轻视这些客体。价值无涉性的预设根本就搞错了。

伊斯顿^①的著名论点认为政治涉及的是“权威性的价值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②。如果我们偶尔在脚注栏中把这一论点当做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接受的政治定义,那么在这种描述中几乎一切都成问题。权威如何实现?什么东西区分了分配与正义?财富或价值究竟为何必须得到指派、分发或安排?财富和职位的分配是否真正构成了政治的本质?如前所述,为了借助各种被认为自明的前提而迈向关于它们所感兴趣的细节问题的准确研究,各类专门的学科通常满足于勉强答复那些原理问题。各类定义把自明的东西聚集到了一起。人们也许并不会对我提出异议:[伊斯顿的]这一引文由于作者本人及学科的进展已变得陈旧过时。恰恰是所有人都能援引且今后也会援引的陈词滥调反映了各种前理解(Vorverständnisses)都是空洞的套话(Gemeinplätze)。

与这一类行业的习以为常相对,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③或于尔

① 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1917-2014),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政治科学家,曾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长。——译者注

② 大卫·伊斯顿:《政治的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1953年第一版,1971年第二版,第五章。——分配(Allokation)——配给(Zuteilung),指派(Zuweisung)——作为专业术语源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会的体系》(*The Social System*),1951年,第114页末:“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伊斯顿后来从多方面谈论了权威者。

③ 也许《什么是政治哲学?》(*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芝加哥,1959年,第12页)这一讲座可用作一个例子:“政治的事物依其本性就从属于同意与反对、选择与拒绝、赞美与责备。它们本质上就不是中立的,而要提出关于人的服从、忠诚、决定或判断的主张。如果一个人没有以好或坏、正义或不义这样的思想方法来严肃判断显白或隐微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用某种好或正义的标准衡量该主张的话,他就不理解它们作为政治的事物究竟是什么”。

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①这些作出不同论证的著者已经做了通告:要在正确理解社会政治科学的旨趣中,重视原初对法律的忠诚或一种无条件接受的“规范性”观点的各个组成部分。没有相应的前提,社会的形成就拒绝给予考察者以所期许的说明。为了这个目的,施特劳斯已经在他的工作中恢复了自然法的名誉。这也许会作为保守的偏见而遭到人们的痛斥。在哈贝马斯这一边,他渴望一种解放的看法。在这种看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对象第一次真正发出声音。针对学术专业潜在的实证主义而作出的这种进步的辩护,首先赋予哈贝马斯式的分析以穿透力。

另外,一个重要的思考与政治学所宣称的经验性的(*empiristischen*)处理方法相抵牾。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现如今政治科学简直可以说就等同于民主制理论(*Demokratietheorie*)。对这样一种偏爱的强调并不总是清楚地表达出来的。很自然地,它直接植根于那些新近关于独裁体系的经验^②。虽然在人世间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教科书上的那种民主制,而且与此相对,一种多方面的混合形式扩展了开来,但是没有人再会捧起古老的政体表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连同它们的变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这些在德性和恶习目录的意义上作出的划分曾经属于口口相传的知识水平。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弗·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③,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在晚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政治(*Politik*)的著作(1835年)^④。在这本书中,他仍一再重复古典的划分。至少19世纪时兴的戏剧还围绕着“君主立宪制”(konstitutionelle Monarchie),它是革命时代之后理性宪法领域里君主制王朝的继承者。

在其仍然存活下来的地方,君主制只具有符号的特征。贵族的意义已经一再遭到剥夺。如今我们不再谈论封建的残留而是谈论职务上的精英。与此相

① 一个早期的文本是1958年的《论政治参与的概念》(*Zum Begriff der politischen Beteiligung*)的导论,它在哈贝马斯与其他人一同出版的研究著作《学生与政治》(*Student und Politik*) (诺伊维特,1961年)中成为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学生运动的奠基性行动。在那里哈贝马斯写道:“政治科学逐渐放弃了由原则出发寻求民主制的根源,这对于古典社会哲学和古老的国家法学学来说一度流行;它用公共机构组织抽象的规定替换其客观的意义。政治科学不再根据法治国家状态和人民主权的原理进行演绎,而是通过民主制实际的机关来定义它。”刊于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Kultur und Krit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3年,第9页。

② 比较 M.G.施密特:《民主制理论》(*Demokratietheorie*),第三版,奥普拉登,2000年,前言。

③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弗·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1785-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④ 这部著作由曼弗雷德·里德尔(Manfred Riedel)重新编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8年)。

对,民主制得到广泛称颂,据说它是现代性的内在目的(Telos)。西方的模式(*westliche Modell*)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器重。富裕与民主制似乎是一对长久未被认出的姐妹。谁寻求富裕,谁就欢迎民主制。在当下,西方的模式表明是国际性的驱动力。

虽然政治学的研究关心的是多方面系统的比较,但没有一种系统的比较打算与人种学,以及人种学对欧洲以外关系的爱好、给予“异己者”与“他者”以优先权这种做法相匹敌。“第三世界”顶多引起了同情——尤其在“第二世界”垮塌之后。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同情产生的动机是人们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清除各种现存的差异。尽管存在一些多元文化的弦外之音,西方模式的霸权地位仿佛被嵌入到了专业文献之中。另一方面,这一点也证明了近来对于结构性体系更迭(*Systemwechsel*)的增强的注意力,这一体系更迭铸就了1989—1990年之际时代转折^①之后的欧洲图景。这一更迭遵照西方模式的方向并失去了所有激发的潜力(*Erregungspotential*),在此之前,这种激发的潜力围绕着一场真正革命的种种冒险的变革,在这当中没有旁观者能够知道事情将如何发生^②。

然而,自引起国际恐慌的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们看到自己正面临着一种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6年对此就已有所预言了^③。但是,自那些事件之后,得到启发的人们相信亨廷顿所说的东西必然存在激烈的矛盾。西方模式的支配地位感受到了来自伊斯兰文明的恐怖主义式的反对,没有人预见到这一反对,至今也没有人领会这一反对。因此,从这一反对中会发展出什么东西也仍然处于完全的晦暗不明之中。

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在当今各信仰教条下的一种基本人道的相互理解之上(汉斯·昆),西方关于文明对话的观念具有其基础;但这一观念遭到了驳斥,因为某些信仰的教条存在于一种不听启蒙运动驾轻就熟的宽容命令的状态之中。与此相对,对进一步启蒙的呼吁显然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各种流血攻击以恨意对抗的恰恰是这种呼吁。不愿见到这一点,即不接受一种由最外在的进攻性所宣称的敌意,意味着我们完全不理解任何东西并变得没

① 这里指的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及随后东西德重新合并的这一系列事件。——译者注

② 请比较克劳斯·冯·拜默(Klaus von Beyme):《东欧的体系更迭》(*Systemwechsel in Osteuropa*),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4年;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体系的转变》(*Systemtransformation*),奥普拉登,1999年。

③ 《文明的冲突》,德译本,慕尼黑,1998年。

有行动能力。因此,欧洲中心主义将表明是一条值得捍卫的道路,恰恰这样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世界的各个部分强烈地拒绝屈服于它。

历史的驯化(*Domestikation der Geschichte*),对它的繁荣与萧条、充满希望的正道直行与一意孤行的无法预测的忽视,在最发达的社会科学那里达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程度。我们或可提到一篇来自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遗稿的文本,它表明:就像所有的鲜活血液从政治理论中消失那样,在旧欧洲的意义上,它在围绕着共同善的集体努力中流动,它的知识、教育、维持以及传播的动力在社会化中流动。

卢曼写道:“我们看到,各部分系统都受到整体系统运作方式的指导。由此而来,各部分系统通过运作参与到整体系统的再生产之中。也就是说,政治交往造就了社会。由此,例如国家与社会或政治与社会这样的表述失去了意义。现在涉及的并不是那些人们可以使其相互对比彼此排除的事态。从系统理论上说来,它也并不涉及系统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政治系统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系统与周围世界。……但是那么说来,社会就是以下这两者:政治系统及其内在于社会的周围世界。政治系统的内部与外部都要发生交往。这就引导到了这样的问题:……政治的特性究竟如何与其他社会性的交往区别开来。”^①

在下文中我将作如下的处理,即从历史的起源提出政治的特性(*Spezifik der Politik aus den historischen Quellen*)。而历史的起源为我们领会社会生活方式这一组织的问题提供了一切文化上的基础。于是,一开始在古希腊人那里就产生了政治概念的组成部分。在其中,没有道路能够通往我们一向所知或自以为所知的关于其他文化中历史条件的东西。而我们可以考虑的是,去理解与城邦联系在一起的古希腊哲学诸问题及其不间断的持续影响。试图否定这一点或从计算中取消这一负担,似乎都是毫无希望的。这一尝试也并不预示着我们将获得任何知识。

在古风时期^②的前奏(*archaischen Präludien*)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实质性的辩论中产生了完全展开的政治理论。虽然我们可以说,对于整个欧

^① 卢曼:《社会的政治》(*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A.基泽林(A.Kieserling)编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0年,第16页末。

^② 古风时期,一般指的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80年这段时期的古希腊历史,又称古朴时期、远古时期。它是古希腊先于古典时期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定义最早出现在18世纪。在对古希腊艺术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这个时期出现的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后来的古典时期差异颇大。因为这些艺术风格也反映了希腊的古典艺术风格所以称为“古风”。——译者注

洲政治思想来说,直到康德理性批判中哥白尼倒转这一分界线为止,亚里士多德主义一直在场,甚至在新近的争论中构成了一个根据点;然而人们必须承认,这些紧迫的问题首先出现在柏拉图与智者们围绕着希腊精神的斗争中。换句话说,政治哲学的诞生与苏格拉底这一形象联系在一起。

从历史上看,近代按照科学理性标准安排的政治理论的观念离我们更近一点。**城邦**(*Polis*)的生活问题对于古代人所意味着的东西,今后将支撑着**国家**(*Staates*)这一组织机构。霍布斯在利维坦这个神话中召唤出了国家。自此之后,一条令人难忘的[对霍布斯进行]原则性回应与修改的山脊线(*Kammlinie*)出现了。在[对霍布斯国家概念]多方面断断续续的反应中,带有黑格尔烙印的国家概念表达了出来;它至少在意义上重新接续了伦理性的生活世界。于是,针对古代的各项预先规定,同样重要的现代精神的反应渐渐显露了出来。本研究的第二部分致力于研究这一发展的各项基本特点。

总体上说,就我看来,这里涉及的根本不是观念史,并不是对于某项研究进行博物馆式的纹饰;而这一研究只能富有成果地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幅同时泛滥着廉价的政治谈论之修辞学的图景中,我们一开始就概略地叙述了一种实质上得到领会的政治概念的空白;这种空白推动着我们重新在原理维度中开始思索。我们应该从历史上和系统上理解这里摆出的提纲,而不用看出此二者间真正的沟壑。

我试图再次概括一下本书的旨趣。当我们虽然经常谈论政治但在概念上不能完全兑现自己所意谓的东西时,我们就把目光转向欧洲的起源,这些起源把一种不可推导的合法性观念与城邦的秩序和统一性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存在论的结合。当近代国家一开始展开一种理性的个人生活并由主体性原则来定义其公民的时候,这种结合逐渐松开了。如今稳定与自由此二者处在一种需要中介的对立之中。到了近代的晚期,这两条路线再次相互靠拢。以个体主义名义的自由的冲动迫切需要一种客观上迁就于它的世界形态。于是自由主义显露了出来。

如果我们通观整个思想谱系,我们就不会停留于一种解决办法的建议,而且我们会更好地明白什么是政治,因为我们在一个变化的政治的语境中认识到一种对基本需求的阐释。

附录与预览

克劳斯·冯·拜默(Klaus von Beyme)写道,“政治科学在其诞生时就是毫无创见的”,他必定明白这一点^①。几十年前,于尔根·冯·坎普斯基(Jürgen von Kempster)表达过完全类似的不满:所谓的政治的科学涉及的是一种来自观念史,法学的国家学说,经验的和系统的社会学,比较的组织机构的知识,当代史和简单的民意测验等方面的融合^②。对于分析当代更加复杂的社会来说,这样一种各门学科、各类知识、各种方法的联合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而且与有影响的大众传播和政策咨询的情况相同,这样的研究者在各个大学和大学之外的机构中并不少——致力于所选择的专业,一名科学家将因该专业而出名。于是他被视为其专业学科中的权威,并且在其领域方面总是一再接受问询和雇佣。

这种专业化长久以来固定了下来,而只有很少的人觉察到这项尤为艰难的、对一切所谓的利益与学科进行汇集比较的综合工作。在极端情况下,这种汇集比较颇有成效,但其代价却是一种最外在的抽象,它无差别地对待一切对象。直到逝世前,尼克拉斯·卢曼^③在越来越迅速出版的著作中苦苦钻研它的系统功能论的宇宙,它展示的完全是重复的空虚。卢曼以一种可见的理论家之讽刺伴随着标准化商品的大量生产,这是为了由此另外来说明:对于系统学的一切高级的要求与“古欧洲的”诸种优点相联系,而我们实际上能赶超这些优点。

① 《二十世纪的政治理论》(*Theorie der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6年第三版,第357页。

② 《所谓的政治的科学》(*Wissenschaft von der Politik—sozusagen*),《水星》(*Merkur*)杂志1969年第20期。

③ 请比较一项较早的研究:吕迪格尔·布伯纳:《科学理论与系统概念:论尼克拉斯·卢曼的立场及其来历》(*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Systembegriff. Zur Position von Niklas Luhmann und deren Herkunft*)。刊于《辩证法与科学》(*Dialektik und Wissenschaf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3年,第112页末。